



红色革命遗址

中山解放中山独立团集结地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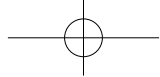
中山解放中山独立团集结地旧址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大鳌溪永丰街1号（大鳌溪学校）。

1949年10月28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后勤部部长郑少康率第一师第一团先锋营300余人到达石岐，控制了石岐城区制高点和水陆交通要道；同时与驻五桂山区的中共中

山县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取得联系，议定于10月30日在石岐会师。同日，中山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暨庆祝中山解放筹备处召集各人民团体、社团学校及地方开明人士等60多人齐聚商会礼堂，议定于30日上午11时前组织群众到达石岐南门华佗庙车站，欢迎解



中山解放中山独立团集结地旧址正面全貌（黄春华摄于2020年10月）



中山解放中山独立团集结地旧址侧面外景
(黄春华摄于202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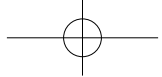
中山解放中山独立团集结地旧址大鳌溪学校俯瞰
(黄春华摄于2021年7月)

放军入城。

10月30日清晨，中山独立团所属各战列部队4个营和1个自卫总队1100余人，以及山区人民团体、学校师生集结在大鳌溪村学校广场。广场设有简易舞台，高挂“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白底红字横额。中山独立团政委、石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旭发表讲话后，政治处主任吴当鸿宣布部队进城纪律和部队进军队列等事项。接着，中山独立团团长梁冠、政委兼石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旭、中山县人民政府县长谭桂明、副县长兼石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黄乐天率领队伍向石岐挺进。中山独立团第十三连从青岗出发，经沙溪入秀山渡石岐河，转入岐关西路，在华佗庙与独立团大部队会合，参加入城仪式。

当天，中山县城石岐万人空巷，涌上街头迎接解放军入城的群众与主要街道商铺悬挂着的千面五星红旗融汇成欢乐的海洋。下午3点，中山各界人民在仁山广场集会，举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暨庆祝石岐解放大会，两广纵队和中山独立团派出部分部队出席大会，并接受各界代表献旗。石岐各界代表、两广纵队和中山独立团代表分别发表讲话，庆祝中山解放。

该旧址（大鳌溪学校）由华侨捐款集资兴建，于1930年建成。大鳌溪学校坐东朝西，为上下两层的混凝土砖瓦结构，建筑占地面积500平方米。该旧址建筑主体结构完好，外观保持原貌，旧址正面外墙上方“大鳌溪学校”5个字依旧清晰可见。该旧址曾为村经联社办公场所、村治保办公室（鳌溪警务室）。



延伸阅读

直至1949年11月，中山县境才基本解放

1949年10月30日，中山的地方人民武装和五桂山根据地支前群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先头部队在石岐胜利会师，是为中山解放日。但此时中山仍有部分地区还处在国民党残敌的控制之中，直到当年11月，中山县境才基本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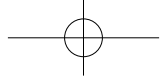
广州及周边解放后，部分残敌溃退至中山。1949年10月29日，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奉命组成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以曾生为司令员，尹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司令员，严尚民为参谋长，杨康华为政治部主任，邬强为副参谋长，刘田夫为政治部副主任。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决定，由上述7人组成中共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前线委员会，曾生任书记。前线委员会领导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珠江三角洲地方部队，歼灭敌保安第三师、第五师及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残部，肃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股匪和反动地主武装。

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第二团、第五团、炮兵团和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抵达中山，随即分三路南下继续扫荡残敌，先在前山、岐关全线肃清敌踪，复将退守南屏、湾仔一带残敌歼灭。至11月4日，除部分海岛外，中山县境基本解放。

11月5日，十多艘国民党军队的舰、艇、运输船停泊在银坑东南800米处，距澳门南端妈阁山六七百米。敌军炮舰“清远”号把戴着钢盔的解放军哨兵误作自己人，于是派一只小舢板来联络。当敌人看清了岸上的是解放军后，立即蹲下来拼命划桨后退，两广纵队二团的迫击炮立即开火。同时，敌军炮舰上的机关炮亦开火，掩护敌舢板撤回。双方激战20分钟，敌军炮舰一艘和运输船“联益”号被击沉、炮舰“清远”号中弹两发被迫挂白旗表示投降，但并没有向岸靠拢，其余的小运输船、艇逃往澳门。两广纵队在中山独立团的配合下，于11月5日解放了南屏、湾仔。

之后，按照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的部署，解放军进一步发动对沿海岛屿的攻势，先后解放了大小横琴岛、高栏岛、三灶岛、淇澳岛等岛屿。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迎着黎明的曙光——解放战争时期中山红色故事》，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版，第98—99页）



卖蔗埔起义遗址

卖蔗埔起义遗址位于原中山四区牛起湾、齐东、濠头先锋宫交界的山丘地带，即今中山市东区街道东文路周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4月19日晚，中共中山县委贯彻中共广东区委关于要组织行动，应付紧急时势的指示，以召开农工学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为名，研究筹划举行全县性的武装起义。4月23日凌晨，由熊晓初、廖桂生带领的四区农军，由柳通带领的五区、六区农军，农民运动特派员梁九胜带领的三区、九区农军以及七区、八区农军分别由水路、陆路向牛起湾进发，准备在卖蔗埔会合后，由李华炤、黎炎孟带领进攻石岐。由于国民党驻军三十九团和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事前知悉起义计划而及早防范，因此4月23日凌晨，在各路农军未到达集中目的地时，事前驻守在卖蔗埔右侧山冈的四区农军自卫队长熊晓初、指导员周秀文所带领的100名农军，便被国民党军三十九团和县宪兵大队包围，战斗就此打响。天蒙蒙亮时，李华炤带领的农军部分主力、廖桂生率领的张家边农军中队长到达卖蔗埔便立即投入战斗，在外围奋起还击。在陆续赶到的农军的增援和掩护下，李华炤、熊晓初等带队突出重围，边阻击边向张家边、白企、贝头里一带撤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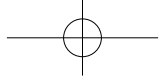
卖蔗埔起义遗址标志石碑周边全景
(黄春华摄于2020年10月)



卖蔗埔起义遗址主题纪念公园
(黄春华摄于2020年10月)

余各路农军得此情况而退回原地，后化整为零，转入分散隐蔽活动。战斗持续两个小时，农军伤亡数十人，四区农军中队长廖桂生在突围时英勇牺牲，不少被捕的农军当场被枪杀。

卖蔗埔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共中山地方组织在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中，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尝试，



是中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枪杆子，敢于武装反抗反动势力的开端。起义发生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十天，距“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不过一周，在全省乃至全国较早树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从1927年4月19日做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到4月23日领导武装起义，仅5天便在全县组织3000多名工农自卫军，行动、组织之迅捷，涉及范围之广，足以震慑国民党当局。卖蔗埔起义为中共中山地方组织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教训。

2013年4月，卖蔗埔起义86周年之际，中共中山市委于东区街道利来街小公园的草坪上立起卖蔗埔起义遗址标志石，以志纪念。标志石坐东向西，高2米，宽1.2米，碑正面刻有“卖蔗埔起义遗址”7个字，背面是卖蔗埔起义的历史简介。

该遗址于2006年6月由中共中山市委核定公布为中山市革命遗址，并作为中共中山市委党史教育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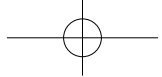
延伸阅读

这批革命先驱不畏白色恐怖，坚持斗争

卖蔗埔起义失败后，刘广生、黄健等36人被通缉，中山革命活动由高潮转入低潮。面对严峻的形势，部分共产党员转移到外地进行隐蔽活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会议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中共中山地方组织根据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在隐蔽中积极筹划秋收起义。同年秋，受中共广东省省委常委、农委书记阮啸仙委派，刘广生从澳门返回中山发动秋收起义。刘广生回到家乡龙眼树涌村后，召开党员、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决定在树涌村举行小暴动，打击土豪劣绅，以影响和引导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压迫。

龙眼树涌村地主刘国年等眼看村中农会的力量日益壮大，恐对己不利，便暗施毒计，企图乘农会宣传员刘伟棠、刘达行不备之机，派人暗杀他们。阴谋败露后，刘广生等组织会员骨干捉拿刘国年。刘国年闻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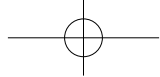
逃走，并到中山县县长兼民团总团长梁鸿洸处告状，诬告树涌农会造反。于是，梁鸿洸下令县兵大队及县民团出动几百人围攻树涌村。农会自卫队队长刘华安不幸牺牲。

此事激起群众的义愤，县民团撤出后，刘广生即与众人商定，组织本村农军四五十人攻打刘国年等土豪劣绅，以示警告。国民党当局即下令通缉刘广生等，并派兵追捕农会骨干。刘广生逃脱搜捕转往三乡，路过一山村时，村里恰好发生耕牛失窃事件。村人误认他为偷牛嫌疑犯，将其抓住并押送到三乡乡公所。后来在中山县警察局审理时，刘广生的身份被人识破，后壮烈牺牲。同一事件被捕杀害的还有共产党员刘华安、刘炳禧，树涌乡农会主席刘庭芳，以及刘连安、刘伟棠、刘开业六人。

1928年1月4日，李华焰从中山三角到番禺新造乡，约同黎炎孟前往澳门，拟向省驻港澳的领导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由于叛徒出卖，李华焰、黎炎孟在澳门一旅店住宿时被国民党密探劫持回石岐。国民党中山县当局用尽严刑，威逼利诱，县长梁鸿洸还亲自出马审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两人始终岿然不动，对党组织情况守口如瓶。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决定将他们杀害。1月12日，在押赴刑场途中，两人大义凛然，慷慨激昂，放声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反动统治”“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工农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李华焰、黎炎孟、刘广生的牺牲，是中共中山地方组织的重大损失。由于主要领导人遭到杀害，全县的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1928年初，除九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有所活动外，其余地区的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挺起钢铁的脊梁——大革命及抗战时期中山红色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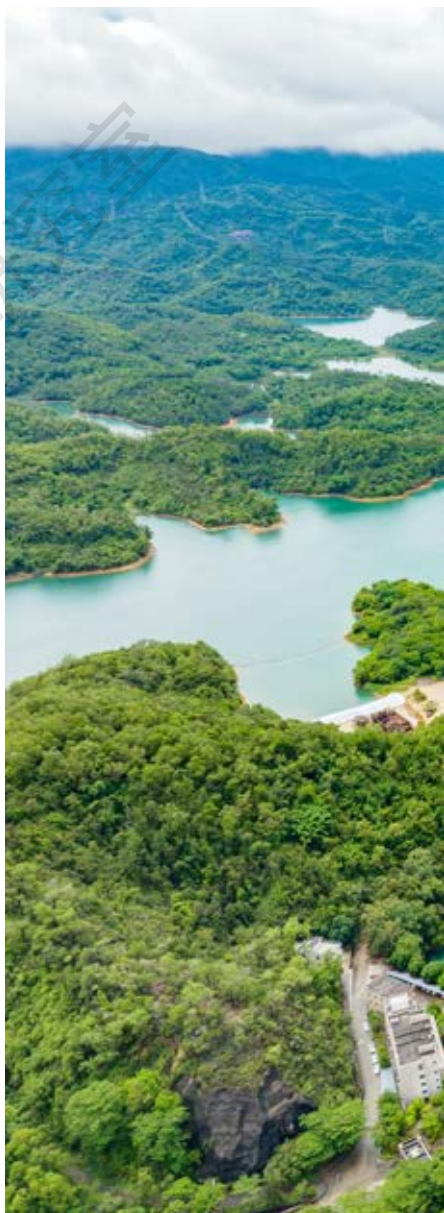
红色遗址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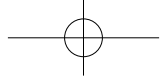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粮食总站遗址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粮食总站遗址位于五桂山区长江乡松埔村、今东区街道长江水库库区内，已被淹没。

在五桂山区内的小村庄中，仅松埔村有一个可容纳三四千人的大草坪。1944年1月3日，中山抗日军民近3000人聚集于此，载歌载舞，庆祝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义勇大队得到中山人民的广泛支持，游击队军需给养来源的渠道逐步增多。1944年7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林锵云兼任主任，欧初兼任副主任，梅重清任指导员。指挥部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财政经济的筹措和开支，如制订征收爱国军粮条令，建立税站，派出较强的干部做税站站长；派梅重清等到澳门，取得某些上层人物的支持，向因避战祸寄居到澳门的地主征收爱国军粮。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各地民众积极交纳抗日军粮、公粮和税款。1944年1月至8月，在中山县的部队收到军粮、公粮、税款共约500万元（法币）；部队收储军粮、公粮4万公斤。

义勇大队粮食总站设在五桂山区长江乡的松埔村，由冯兰负责。为适应部队活动需要，义勇大队又陆续在四区的崖口、三乡、乌石、平岚和山区的石门、石莹桥等分设重点站，在六区及大布、平湖以及泮沙、翠亨、槟榔山、沙岗等村设分站。各站管理人员主要由当地堡垒户妇女担任，共有30多人。管理方面采取分散小站安放与大片掌握分配的原则，部队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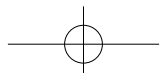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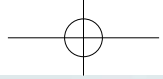


到哪里，就能在哪里解决粮食给养问题。在敌人“扫荡”时，工作人员动员群众一起把粮食坚壁，保证了对部队和政权的供应。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中区纵队和珠江纵队先后成立后，军需给养的工作机构也得到进一步的建立和健全。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粮食总站遗址，现为长江水库库区（黄春华摄于2022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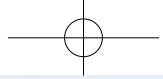
“纽约桥”遗址

“纽约桥”遗址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长江水库内的大寮村周屋。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中山抗日游击大队常驻大寮村，该村村民周华胜热心支持游击队，常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游击队员住。1944年，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举办了多期训练班，培养抗日人才。代号为“纽约桥”的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青年游击训练班就在此举办。

1943年，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为开展对澳门的统一战线工作，先后派郭宁、郑秀、冯彬、黄乐天等到澳门开展活动。郑秀通过澳门纪中学生李成俊，与澳门通用国语学校部分学生及社会青年所组成的“修社”学习小组成员认识后，逐步向他们宣传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把抗日部队出版的《抗战报》及其他资料送给“修社”成员阅读，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1944年7月4日，郑秀首次带着来自澳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培正、濠江、中德、行易等中学和镜湖护士学校的李成俊、郑达明、朱碧等10多名青年学生，利用暑假到中山五桂山参加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举办的青年游击训练班。该训练班代号为“纽约桥”，班主任由欧初担任，指导员是流星队队长黄昌曦。讲课的有梁奇达、杨子江、吴子仁、张彬、郑潮秀等，他们分别主讲部队史、抗战形势、青年问题、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史等。部队对“纽约桥”的学员特别照顾，尽管游击队的生活很艰苦，指战员们只能



“纽约桥”遗址，现为长江水库库区（黄春华摄于2022年5月）

以稀粥充饥，但仍想方设法让“纽约桥”的学员吃饱；虽然游击队战士常常露宿山头，但仍设法安排学员住民居、碉楼或祠堂。

该班的学员是港澳青年和华侨子弟，欧初为学习班起代号“纽约桥”，就是希望学员们能起到沟通家乡与海外的桥梁作用。此后，不断有澳门青年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武装。“纽约桥”先后开办3期，共50多名港澳青年和华侨青年到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受训，其中有李成俊、郑达明、郑杰、郑诚之、赖冠威、刘光普、朱碧、李铁、任艳华、何竹君、郑金秋、曾还、郑汝钿、周宇、胡兆基、李葵等。这些青年从训练班结业后大都参加了“流星队”，

参加民主建政宣传；还有的到连队担任文化教员，或到班上担任政治战士，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或成为医护人员。个别青年如李成俊曾返回澳门担任部队的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他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其中，胡兆基、陈君芝、郑诚之、赖冠威、郑秀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该遗址建于20世纪初，是大寮村华侨周华胜回乡后修建的一座两层式砖石结构的房子。1963年，长江水库建成，为保护长江水库的水源，位于库区范围内的大寮村村民陆续搬迁，至1978年全部迁出。该房已被淹没。